

由小名「阿丕」说起

当电视里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一场场熟悉的戏,一个个熟悉的人展现在眼前,我作为《阿丕书记》的编剧,百感交集,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摊了一地。似乎已经远逝却从没走远的往事一幕幕推到了眼前——

2008年元旦,我编剧的电视剧《彭雪枫》刚在中央一套播出,余热尚在,单位领导让我再接再厉,写一写老一辈革命家陈丕显同志。

陈丕显?这个名字对一直写领袖题材的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文革”初期,他作为上海第一书记在“一月风暴”中与江青作斗争的精彩表现,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可这次是让我写电视剧,而不是什么纪实文学。这段涉及“文革”历史,又是真人真事,可能无法通过影视形式来表现。那么,陈丕显一生中还有哪些片段适合做影视剧呢?梳理中,一下子想到陈丕显曾经与胡耀邦、谭启龙、肖华等人称为党内的著名“红小鬼”,那段年少有为的经历是可以成剧的。哪知不巧,正好赶上央视一频道播出《浴血坚持》,里面有表现陈丕显“红小鬼”的故事情节。我只好放弃这个选题。再往下梳理,聚焦到陈丕显在抗战时期跟随陈老总在江苏中部建立苏中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呢?从做戏的角度考虑,又觉得陈丕显这段时间大多是搞地方工作,又以“副手”职务居多,不太容易纠葛矛盾冲突。编剧者,总是希望剧中主角在现实中也是“主角”,这样才有戏可做。

就在选题犹豫不决时,陈丕显的家人将陈丕显所有的书交给了我们主创人员,其中一本陈丕显回忆录——《历史的转折在湖北》吸引了我的眼光,特别是“转折”二字让我看到了戏剧化的可能,再一看,时间正好打点在1977年到1982年5年间,这恰好又是我国改革准备起航阶段,特别是刚刚结束“文革”,无论是人们的经济生活还是意识形态都处于困顿状态,而湖北这个昔日素有“鱼米之乡,九州通衢”美名的大省,经过“文革”10年,已经成为经济停滞不前、案件堆积如山的问题大省。此时陈丕显临危受命,前往湖北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担任了第一书记)。他将面临冲破改革初期的阻力,让改革大船顺利起锚的考验。这不仅需要勇气与力量,还需要“舵手”敏锐的政治眼光。这对于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来说,无疑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5年,事件、人物与时间犹如天时地利人和一样,正好符合戏剧的要求。于是我和导演商量,又与陈丕显的家人交流,大家和我感觉一样,非常认可截取这一段作为全剧的起始点。

一起点找到了,那么走向剧终的过程却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众所周知,将历史题材写出新意并非易事,要靠艺术真实把历史的真实展现出来,还要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化作一个个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

那么像陈丕显这样一个在领导高位的省委书记如何去接“地气”?那些形而上的决策方针如何镜头化?历史转折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如何戏剧化?敏感的政治事件又如何掌握分寸?还有“大事不虚”之下如何做好“小事不拘”、“不拘”又到什么程度?

这一连串问号中,还有一个最令人挠头的,就是这



个带有浓烈政治背景的电视剧怎样才能平民化、生活化与普通化。这“三化”几乎成了快要是我命的大命题。

很多时候我不是为结构矛盾而苦恼,而是为高层领导干部是如何过日子的生活化而苦恼。一次,我们采访陈丕显儿子陈小津时,无意间又谈起了陈丕显的小名“阿丕”的故事,这个小名是毛泽东、周恩来同一些老大哥老战友们对“小鬼”陈丕显的昵称。我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将省委书记定位在让人一看,就感到亲切,像自家人一样熟悉上。这样一来,“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问题就解决了,“历史戏剧化”与“戏剧历史化”就会随着剧情自然转换。

正如预料的那样,“阿丕”这个小名,让我们找到了一个省委书记“接地气”的“戏眼”。写剧本时,我想尽办法把陈丕显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刻画,力求写得感性一点,更生活一点。剧中还大胆地在“小事不拘”上下功夫,发挥艺术的想象力,围绕陈丕显真实的历史事件,设计了几个家庭的命运戏,塑造了一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与基层干部形象,使得他们在与省委书记交往中,有了自然而然的亲切感。

因为有了明确的人物情感定位,剧中讲述陈丕显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带领省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如何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执政为民等貌似“形而上”的戏,便有了扎根的土壤。他大刀阔斧地抓湖北的经济建设,抓武钢、二汽和

葛洲坝水电工程建设,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抓涉及民生的“温饱工程”,使湖北的各项扶贫工作很快走出了低谷的真实历史事件,变得生动了,剧中人物也鲜活了。同时,我们又根据他的家人与身边人员的讲述,找到了陈丕显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点。比如他患有鼻咽肿瘤,但又爱吸烟;他有些惧内,但又会搞一点小“战术”用调虎离山方式躲过妻子的“监控”。他们夫妻间那种相互搀扶,相互爱护,有时会闹矛盾,最终又以幽默的方式化解,等等,这样的生活细节一直贯穿全剧始终。

我的体会,只有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将领导干部的人性与人情写出来,剧本才能有亲和力,拍出来老百姓才会喜欢看。也由此明白一个道理,主流思想要成为引领社会风气的航标,不仅需要我们创作者有担当的勇气,有使命的责任,也需要我们编剧有笔耕不辍的坚持,更需要我们远离喝彩去挖掘历史大背景下的沉默。

我们编剧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观众去感受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屏障后的真实情感,看到一个积极人生带给心灵的启迪,让舞台上的悲剧在人间消失,让人间正气在舞台上弘扬。

创作谈

《阿丕书记》为传记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新经验

由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上海中船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阿丕书记》4月16日起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丕显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带领省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执政为民,使得湖北的各项各项工作取得迅猛发展的历史过程。日前,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在京举行该剧的专家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该剧在创作上做到了忠于历史与忠于史实、反映时代精神与体现现代审美

意识、呼唤英雄与英雄精神的统一,采用较为平实的现实主义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儒雅、亲民、一心为民的好书记形象,让人感动、让人敬佩。

陈丕显在湖北工作5年,身边所发生的国事、家事、身外事,包括剧中出现的小事,映照着、折射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何将陈丕显的形象塑造同湖北的工作、生活,乃至整个历史进程艺术化地结合起来,与会者认为,以党的领导干部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传记片,在形象塑造时应恰当地处理历史戏剧化与

塑造亲民、爱民的领导干部形象

□贾钢

阿丕是陈丕显同志的爱称,毛泽东和很多中央首长都亲切地唤他阿丕。从这一点就可以感觉到陈丕显同志的性格、他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他和同志们相处的关系。这是创作《阿丕书记》这部戏,进入人物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陈丕显同志是一个很“阳光”的人;一个亲民、爱民、心系民忧的人;又是个有领导能力、能把握全局的人;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既拿得起,又放得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人都和他亲。

创作剧本的依据是陈丕显同志的回忆录《历史的转折在湖北》。作为导演的我,这本书也是反反复复地看,为的是找出表现陈丕显同志最有作为的大事件来,然后以这些大事件为背景,或为载体去构思设置人物和故事。这些大事件中有的是涉及敏感问题的,我们就仔细研究找到解决敏感问题的办法和思路。比如剧中表现真理标准的讨论,涉及“两个凡是”,我们就是通过陈丕显和谢志成交谈认识;通过陈丕显做工作,使省委副书记孙志毅和老劳模李宝根师傅的思想转变来表现的。

陈丕显的贯穿行动是为人民解忧,从开始解决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的问题,到解决群众的副食品供应问题,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解决葛洲坝工人生活问题,解决农业学大寨的盲目性问题,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和所涉及的体制问题,解决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解决抗旱问题,解决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解决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解决农村改革问题,解决经济调整中大中企业的存续问题,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解决建设大湖北经济圈战略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都是表现陈丕显这一级的领导人水平和能力的,也是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品质和作风的。

一句话,这个戏的主题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该怎么做?《阿丕书记》应该成为一个榜样,教育我们的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的理念。

我把这个剧的体裁定为具有史诗性的生活正剧。史诗和生活好像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但这恰恰是我为这个剧所定的调子。一方面这个剧表现的是大的历史背景,而且是直接写这段历史的大事件,包括真理标准大讨论,包括党在一时期很多重要会议所传达的精神。从十届三中全会、全国科学大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央解决农村问题,解决经济问题工作会议,这些大事件都在剧中有着直接的表现,并且把这些大事件与人物的思想感情紧紧地联在一起,甚至很多情感的抒发都在关乎国家、全省,关乎政治思想,经济命脉的层面上,非常宏观。这就是所谓史诗性的表述。但史诗性的高度并不是在云彩眼里,而是实实在在

在通过人物和人物关系、人物行为来表现的,剧中所有大事件、大背景都是通过几个家庭的生活传达出来的。所以说史诗与生活是这个剧最主要的风格特征。

这个剧人物众多,为了梳理得清晰一些,我把人物分了四类。戏剧艺术最重要的美学功能是塑造人物,剧中人物无论大小、戏份多少,我都认真对待。

戏剧历史化的关系。并不是发生在人物身上的每一件事都具有戏剧的质地,很多行为很先进、很伟大、很光辉,但不见得都具有戏剧的特质,都可以演给观众看,这就需要将历史戏剧化的智慧。同时,还需要在真实的基础上适当地虚构。该剧在塑造陈丕显时就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以此带动所有的矛盾冲突往前发展,既体现了老一辈领导干部的民本情怀,也在艺术造型、典型塑造上为传记题材电视剧积累了新的、成功的经验。

(徐健)

艺 谈

“粉丝电影”有悖艺术本质

□周思明

近年来,一个粉丝加盟电影以扶起国产电影之风,悄悄在电影市场刮起来。继杨幂主演《孤岛惊魂》以500万不到的投资赢得9000万票房纪录之后,韩庚、吴尊、大S等众多偶像明星又加盟电影《大武生》,上映首周票房即突破2000万,再次刷新票房纪录。而主打青春偶像牌、以主演偶像的粉丝为目标观众群的《五月天追梦3DNA》《紫宅》也引来网上粉丝的热烈回应。粉丝电影的集中出现,似乎在昭示着:一个粉丝电影时代,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汹涌袭来。

粉丝的加盟,的确让中国电影尝到了一些甜头。荧光棒、大条幅、海报、尖叫声,将偶像们抬到了巅峰位置,也带动了电影市场的火爆,让电影制片方赚足了腰包。不惟如此,粉丝们还以各种方式为偶像吆喝。有报道说,南京粉丝团组织者之一、网名为TIEN的田小姐已组织包了两场《五月天追梦3DNA》,且在生活中、网络上不断向朋友推荐这部电影,为他们写影评,有意识地进行团体协作宣传。电影《大武生》放映时,粉丝们还主动提供海报、光碟等宣传品,许多粉丝自己印发传单,走上街头向陌生人发放。

粉丝们的力量当然是强大的。遍布各行各业的粉丝们,其宣传力度甚至让媒体舆论、发行公司叹为观止,而粉丝们发自内心的推荐也远比商业宣传更为深入人心。

除了贡献票房力量,粉丝们客观上也为规范中国电影市场秩序出了把力。以往电影尚未下线,网络上就会出现盗版,而粉丝们在影院一旦发现有人偷录电影,就会让影院出面制止,堵住很大一部分盗版源头。对于粉丝电影火热之现象,有学者指出,很多偶像原是文体明星、歌手等当红公众人物,他们的事业由电视荧屏、演唱舞台延伸到电影银幕上,为他们个人发展拓展了空间。从积极角度来看,粉丝电影的出现是中国电影与时代接轨的一种表现。青年是电影的主要观影群体,也许中国电影正是瞄准了青年人的观影脉搏,迎合了他们追捧偶像的心理,才赢得了电影票房神话般的纪录。

然而,电影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对演员具有较强表演素养、生活体验要求的艺术形式,仅仅靠一时的市场效应,很可能导致价值失衡,带来电影事业的昙花一现。虽然电影邀请偶像加盟目前似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它们毕竟是有本可依,以特定的主题剧本为电影主体。而粉丝电影则完全以偶像为卖点,其井喷式地为电影带来票房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带来必然的隐忧和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讲,一部电影如果仅靠偶

像来支撑,弱化电影其他元素,虽可暂时性地获得丰厚的收益,但对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却是不利的。电影价值包括社会文化价值、创新的艺术价值、市场商业价值,优秀的电影应该同时具备这三种价值。现在的中国电影过分追逐市场价值,整体水准高的作品很少。而粉丝电影的出现,只能加剧这种负面现象的严重程度。中国影视明星片酬已高得惊人,据称占总成本的60%左右,如果一部电影过分倚重偶像支撑,那么必然会带动明星片酬的攀升,中国电影的艺术品质也将得不到保障,逐渐下滑。

在粉丝电影运作中,粉丝已然上升到与偶像同等重要的主体地位。偶像重视粉丝,与粉丝近距离接触,关注粉丝们的感受,实现了电影表演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的转变,这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制片方为掏粉丝的腰包而竭力讨好粉丝,一切从粉丝立场出发,电影制作就会被粉丝们设定的条条框框、为时尚的诸般浅薄元素所左右。不少粉丝电影无论其宽度还是深度,都开掘不够,只靠消费偶像自身的那点魅力与人气维系着电影之生存,很少考虑用真诚动人的故事重构电影形象。

问题的关键是,电影主创者是以市场原则为先,还是以艺术思想体现为先。目前,电影导演、制片人选择偶像扮演电影角色,可能是一步奇招,有创造票房神话之功效。正因为此,不少导演放弃了对纯艺术效果的追求而主动向市场妥协。难道我们的电影票房真的要依靠这些“粉丝电影”来拉动吗?电影承载的是人的道德和情操、思想和精神,承载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传播。如果一切从商业化角度出发,抛弃了电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最终毁掉的还是电影本身。

从这个角度讲,过度使用偶像,粉丝明星还是值得商榷的。电影毕竟是用形象塑造典型,用典型诠释文化,用文化弘扬精神,用精神鼓舞人心。电影中的主人公,观众对其抱有更多的艺术期待和思想期待,尤其是21世纪的广大观众,他们无论在文化水平、思想水平,还是审美需求和生活体验上,对演员、表演的挑剔更为苛刻。尤其是对民族英雄、道德楷模角色的塑造,此类演员仅仅“形似”还不够,必须具备“神似”的条件,因为和普通人物相比,影片中再现的主人公是早被历史和社会符号化了的典型,具有历史的价值,蕴涵着民族的记忆。由此而言,提升中国电影质量,塑造真正打动人心的形象,还是应该立足电影本体,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粉丝电影不是捷径。



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研讨会——

纪录片样式与剧情片结构高度融合

22岁的江竹筠站在窗前,看到路

灯下老彭等待的身影,心中一阵温暖,回头向闺蜜何立告辞,“我走了,一出巷口,你就不要看我了。”“我偏看!”何立故意逗她。江竹筠迈着幸福的脚步离开,何立则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老重庆的夜色中……这温暖的一幕,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一段描述,而是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中改编自真实历史的一个片段,连台词都与当事人的回忆完全一致。这时,距离江竹筠被捕,成为红岩经典人物“江姐”还有5年。正是用这些真实片段,导演宁敬武耗时两年,编织出了这部风格隽永、感人至深的女性传记电影。

4月13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报社主办的电影《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片以小学时代就与江竹筠不分你我的挚友何立老人的回忆为视点,展现了江竹筠从少女到母亲,从青春懵懂到产生革命信仰,经历爱情,结婚生子的全过程;同时,将历史真实细节与电影写意相融合,还原大时代下一个理想主

义女性的柔情本色,为这个短暂而光彩的生命存照。

2009年,北影资料室的一本油印小册子《江竹筠烈士事略》成为了这一切的源头。在此后的两年中,影片制作团队走访全国各地,采访了江竹筠生命中各个阶段的重要人物。通过他们的讲述,影片获得了大量从未披露的第一手材料,最终以采访与剧情相结合的形式,向观众娓娓道来。在《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中,观众将重新认识一个可爱可亲的“江姐”,真实感知到她在今天看来仍旧洒脱、浪漫的人生故事。与会专家对影片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从创作方式到艺术风格上罕见地将“真实和写意”、“纪录片样式和剧情片结构”高度融合的影片,是一部近年来有创作突破意义的传记电影。

《我最好的朋友江竹筠》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广播电视台(总台)、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宣传部、重庆艺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一声春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摄制,并将于近期登上大银幕。(艺文)